

Chapter

1

印度人 與港同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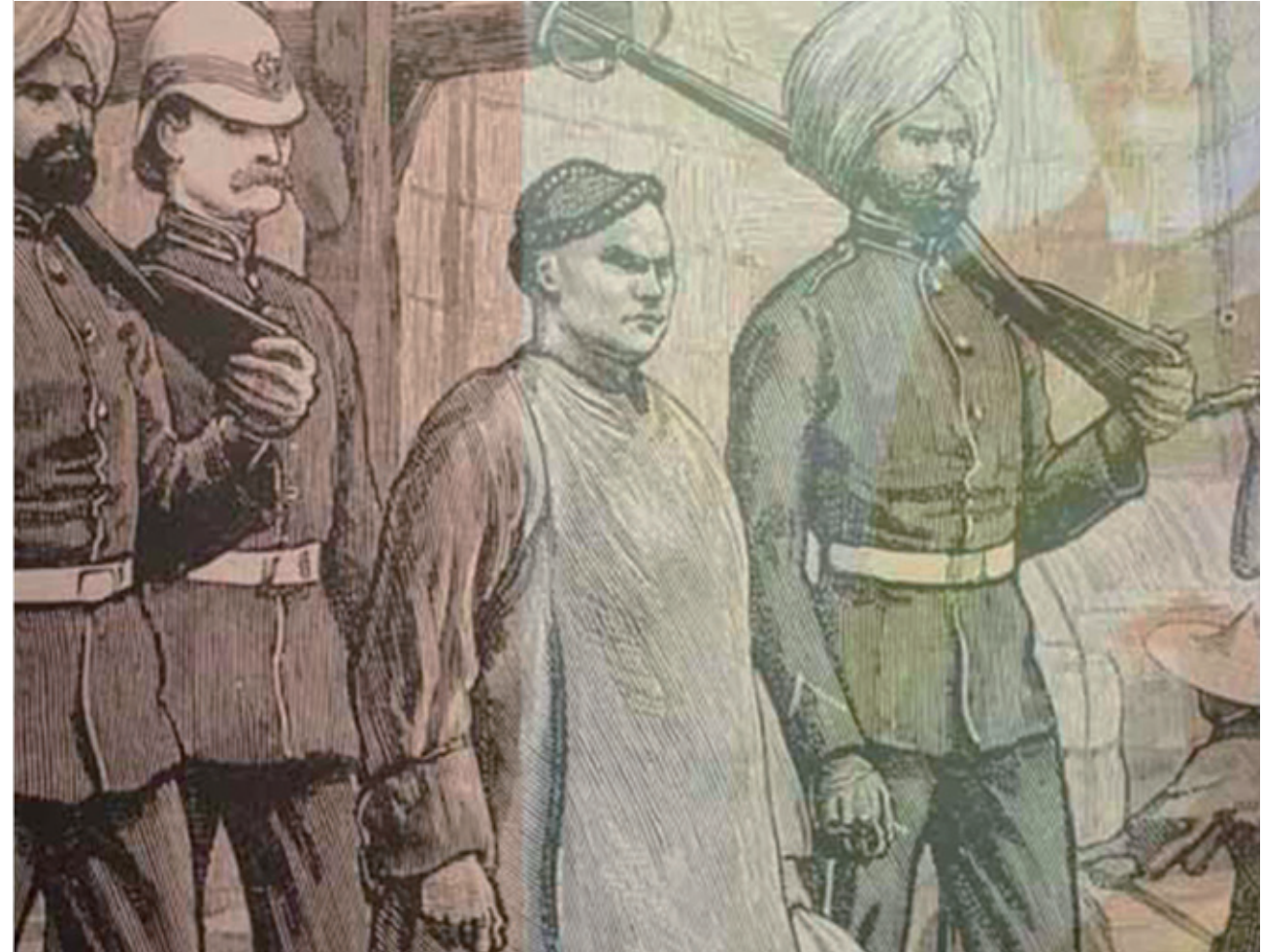
印度人 與港同在

自 1841 年香港開埠以來，印度人一直是城市的一部分。他們涉足多種行業包括國際貿易、鑽石買賣、軍人、警察和裁縫，是構建這個城市的重要部分。此外，也有從事法律、醫藥和金融業，或在政府機構內擔任重要角色。20 世紀 90 年代，少於香港總人口 0.5% 的印度人，公司業務卻佔香港環球貿易的 9%。今天香港印度人口達 45,000，幾乎是 1997 年香港移交中國時的兩倍。新來的印度人大都是專業人士——工程師、教授和從事金融、科技、保險、珠寶鑽石、船務和貿易。

印度人帶來了他們的語言、宗教、舞蹈、音樂和習俗，並保留至今。他們與祖國及遍佈世界的印度社群保持密切連繫，組成一個有助香港成為亞洲世界城市的緊密網絡的一環。印度社群關係密切，大多數年輕人都是在自己社群內通婚。

→ 歷史

印度人在昔日英國軍隊中不可或缺。1841 年 1 月，當英國國旗在香港上空



→ 中國惡名昭著的海盜張也（Chang Yeh）在香港被捕，刊於 1887 年的《倫敦新聞畫報》（*London Illustrated Newspaper*）。

升起，至少有 2,700 名印籍英兵和 4 名印度商人在場見證這歷史時刻。甚至在香港殖民地還未成立前，印度公司就和中國有貿易往來，不少從事利潤豐厚但危害健康的商品——鴉片生意。

英國覬覦香港，在於她優良的深水海域，是南中國海岸最好的港口，讓英國急於將之成為貨運和貿易中心。

在建立香港貿易及貨運強國地位上，印度人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。1864



→ (上) 中區警署建於 1864 年，由營房大樓和操場組成。為與日俱增的警員包括數目不少的錫克警員提供住宿。

→ (下) 1879 年，獄警管理由警署移交到監獄長。



年，香港匯豐銀行的 13 名創始委員中，有兩名是巴斯人，一名是印裔猶太人。1888 年，一名印度巴斯人創立的天星小輪，今天仍載著乘客遊人穿梭海港兩岸。1842 年，一位來自印度西岸城市蘇拉特（Surat）的穆斯林阿布拉罕·諾丁（Ebrahim Noordin），創立了公司鴨都喇利（Abdoolally Ebrahim），這是香港最古老的印資公司，營運至今。直到 1845 年 6 月，共有 362 名印度人和 595 名歐洲人在香港生活，當時香港的總人口是 23,817。

印度人更是香港保安工作至關重要的一環。二戰前，香港警隊中，印度人佔三分之一，大多數是來自旁遮普的錫克教徒；此外，還有許多其他印度人在英軍和監獄工作。1941 年 12 月，印籍英兵勇抗日本入侵香港。在日本佔領期間，大量印度人被關押進香港各處監獄。直至 1942 年 2 月，香港共有 10,947 名戰俘，其中 3,329 名是印度人。英聯邦國殤紀念墳場管理委員會在跑馬地設立紀念碑，紀念為香港犧牲的 8 名印籍英兵和 1 名錫克英軍；另外，24 名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喪生的印度次大陸回教徒，亦安葬在墓園的回教墳場。

→ 天星小輪

印度人對香港最顯著的貢獻之一就是天星小輪。130 年來，天星小輪往返於港九兩岸運送乘客。幾乎每個旅客訪港期間，至少要坐一次渡輪，至今



→ 自 1861 年起，香港警隊從印度招募警員，先是在孟買，後在旁遮普地區招募錫克教徒。錫克警員獲准保留宗教習俗——他們戴頭巾而非警帽，並獲分配一間祈禱前使用的專屬淋浴房。



→ 1902 年，天星小輪第一個碼頭。

仍廣受歡迎。乘客可以在船上欣賞迷人景色，感受海風輕拂，從緊張的日程中忙裏偷閒，享受幾分鐘的安寧。天星小輪的日運載量超過 70,000 人次，年運載量逾 2,600 萬人次。2009 年，美國旅遊作家協會發佈的民調顯示，天星小輪被列為世界上“十大最令人雀躍的渡輪”之首。

1888 年，商人 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s 創立了“九龍渡海小輪公司”，購入 3 艘渡輪運載乘客。隨著業務成功，他又買了第四艘船。因為每一艘船都以“星”字命名，所以在 1898 年公司易名為“天星渡海小輪”，名字沿用至今。每艘船可載 100 名乘客，平均一天往返 147 趟。1898 年，Naorojee 退休，將公司賣給香港九龍倉公司，當時九龍倉的老闆是怡和集團的威廉·渣甸和保羅·遮打爵士。1972 年香港第一條海底隧道開通前，天星小輪一直是主要的跨海公共交通工具。



→ 香港巴斯祭司正在做日常儀式。

Naorojee 於 1852 年到達香港。他從孟買坐船偷渡到中國，在船上當廚師。他的生意以從孟買販賣鴉片到中國開始，後來除渡輪外，主要生意是管理經營旗下的 4 家酒店。1898 年他退休回到印度後，酒店便交由兒子管理。

→ 銀行、大學和醫院

Naorojee 是巴斯人（Parsees，意謂波斯的），他們追隨拜火教。拜火教是世界現存最古老的宗教之一，公元前 5 世紀於伊朗首次載入史冊。在公元 7 世紀伊斯蘭教誕生之前，它曾是伊朗帝國的國教超過 1,000 年。之後穆斯林征服伊朗，改變伊朗人信仰。許多拜火教徒為逃離宗教迫害出走西印度並定居下來。這個群體為他們的新家園現代化做出了巨大貢獻，他們建設工廠、磨坊、酒店、鋼鐵廠、醫院、教育機構和研究機構，在慈善事業



→（上）香港巴斯墳場。

→（下）跑馬地巴斯墳場內的墓碑。



→ 香港大學陸佑堂內麼地爵士半身像。

上也表現突出。印度最大的工商業家族之一塔塔氏（Tatas），就是巴斯人，巴斯社群幫助孟買成為印度的工商業中心。

19 世紀中葉，巴斯人首次來到中國，在澳門和廣州定居，開設貿易公司買賣香料、鴉片、絲綢及棉花。1841 年 1 月 26 日，當英國國旗在香港上空升起時，4 名到場的印度貿易公司代表中有 3 位是巴斯人。自香港成立以來，他們為這座城市貢獻良多。就像之前提到的，香港匯豐銀行的 13 名創始成員有 2 位是巴斯人。19 世紀 60 年代，香港已有 17 家巴斯人擁有的公司登記在冊。

1861 年，一位名為麼地（Hormusjee Nawrotjee Mody）的巴斯人來到香港，受聘於一位印度銀行家兼鴉片商。之後他開展自己的鴉片生意，其後轉行。1889 年，他建造了太子大廈和皇后行，皇后行所在地就是現在的文



→ 灣仔律敦治醫院。

華東方酒店。他主催籌建香港最古老及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機構——香港大學，1907 年斥資 15 萬港元修建校舍，另外捐出 3 萬港元作資助基金，這在當時來說，為數不少。加上其他捐贈，學校於 1911 年末建成。學校的一座主要建築前豎立著一尊他的半身銅雕像，銘記他的慷慨。1912 年 3 月，他逝世一年後，學校啟用。在 1912 年 3 月 11 日的報導中，《南華早報》這樣寫道：“麼地一生最大的追求之一就是一個眾所能及之處，但他年輕時卻因當時環境而被拒諸門外。這所大學將迎向所有種族和教徒，不會強迫學生修讀某個宗教，而是像牛津、劍橋和其他西方大學那樣尊重學生的信仰。”麼地還是九龍木球會的捐贈者和第一任主席。尖沙咀有一條麼地地道以他的名字命名。這條路上盡是印度裁縫鋪、餐館和零售店。碧荔道和旭龢道都是以著名的巴斯人命名。

1949 年，在灣仔區有一所新醫院啟用，它就是律敦治療養院。主要資金由

律敦治（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）斥資捐贈，以此紀念他 1943 年死於肺結核的女兒達賽（Tehmi Ruttonjee-Desai）。他也是一名巴斯人，1887 年其家族在香港開創了生意。這所醫院是香港治療肺結核的主要機構之一。1991 年，由於肺結核病人減少，療養院改為律敦治醫院，是一所能容納 600 名病人的綜合醫院，提供多元服務以滿足社區需求。它已成為一所急性綜合醫院，提供綜合醫療和外科手術。作為香港唯一一家提供變性手術的醫院，它的外科部門廣受好評。為應對灣仔地區的人口老化問題，醫院近幾年發展了老人科服務。

香港現時的巴斯人祭司是 Homyar G. Nasirabadwala，他正值花甲之年。每天，在銅鑼灣善樂施大廈內，他都會進行源於古波斯的宗教儀式。身穿白裳，臉戴面紗，他每天五次在燃燒著的火盆前禱告。香港拜火教總壇建於 1842 年。

在跑馬地也是巴斯人墳場所在地。過去 70 年，不論在印度或香港，巴斯人社群一直縮減。2011 年印度的人口普查顯示，社群人口從 40 年代的 11.4 萬減少到 5.7 萬。人口減少是由於許多巴斯女性和社群外的男性結婚而且趨向少生育；而嚴格的教規亦令外人難以入教。香港的巴斯人現在大概有 250。

→ 南亞裔 “香港之父”

與巴斯人攜手並肩，共同建設現代香港的，尚有吉席·保羅·遮打爵士（Sir Catchick Paul Chater），一位印度亞美尼亞裔商人、慈善家和熱愛純種馬的賽馬愛好者。他當年是個孤兒，來香港投奔姊姊。他是香港許多領頭公司和早期土地開墾的幕後推動者。1926 年 5 月 28 日《南華早報》刊登的訃告寫道：“保羅·遮打爵士的一生便是香港的歷史。”

7 歲時，遮打成了孤兒。1864 年，他 18 歲，來香港投奔一位姊姊，起初在一家銀行工作。關於遮打有一些精彩故事，比如他是如何在晚上坐舢舨出維多利亞港，測試水深以實施填海計劃。由他成立或共同創辦的公司約有 20 家，其中包括與好友麼地爵士（Sir Homusjee Mody）共同創立的遮打麼地經紀行、牛奶公司、九龍倉的前身香港九龍碼頭及貨倉有限公司。他是 1890 年海旁填海計劃的幕後推手，之後創辦了香港電燈公司。



→ 中環遮打大廈入口處的遮打爵士半身浮雕。

遮打是立法局議員、行政局議員和高級太平紳士。他也是一位藝術收藏大家，曾擔任香港賽馬會主席長達 30 年，又獨資建造尖沙咀聖安德烈堂。

遮打推動香港向前發展，他展望九龍和新界的未來。儘管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丟失了一部分，遮打仍保存了不少著名的藏品，包括油畫、水彩、素描、版畫和照片。如今在香港，你可以在遮打道、遮打大廈和遮打花園找到他的名字，其銅像就矗立在遮打大廈大廳內。1926 年他去世時把自己私人住宅雲石堂（Marble Hall）和所有東西遺贈給香港政府。

→ 印度學校

1891 年，猶太商人、慈善家埃利士·嘉道理（Ellis Kadoorie）為在港的



→ 1916 年，嘉道理爵士為印度學童開辦的嘉道理小學。

印裔學童開設了一所學校。學校取名嘉道理爵士印度學校（Ellis Kadoorie School for Indians），是香港第一間將印地語和烏都語納入課程的學校。這所學校既展現了埃利士·嘉道理的慷慨，也說明當時香港的教育制度只為華人或外國人而設，並未切合印裔學童的需求。這所學校由印度富人贊助，包括與印度緊密關連的嘉道理和夏佳里（Arculli）家族。後來嘉道理決定將學校捐贈政府。1916 年 11 月 16 日，港督梅含理出席新校舍的開幕禮。當年教育司在報告中這樣寫到：“校舍非常舒適，就殖民地的標準來說操場非常豪華。學校聘任了一位英語教師。”二戰期間，嘉道理學校和香港許多學校一樣被迫關閉。戰後重開，其後遷校至西九龍現址。學校一直是官立學校，主要以英語教學。這是所多種族學校，學生來自多個不同國家。學生們必須學習中文，並選修印地語、烏都語或法語。

學校的官方網站上這樣說：“19 世紀 90 年代，在慷慨的嘉道理家族贊助

下，學校始建於西營盤。1916 年，學校由香港政府接手管理，後遷至學校舊址東院道。多年來，學校一直是小學，20 世紀 60 年代才引入中學課程，自此成為男女官立中學。千禧年初，學校遷到現址，擁有一所設施齊備、設計新穎現代化的校舍，滿載能量活力，邁向新紀元。意識到本校學生的多元文化，及回應現代世界變化的需求，本校以全人教育為本，以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為目標，為本地和全球社會所用。”學校的學生有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、尼泊爾人、菲律賓人、泰國人和其他少數族裔。在香港，超過 10,000 名學齡兒童來自南亞社群。

→ 警隊

印度人在新殖民地最重要的一環是在警察部門。香港警隊開始時由英國軍官及旁遮普、錫克、穆斯林警員組成，之後又招募了華籍警員。1906 年，



→ Allah Ditta（1913-1980）之子 Allah Dad Ditta，拿著他父親在香港皇家海軍基地的印度警員委任證。證件上的名字是錯的。



→ Allah Dad Ditta 拿著父親在香港服役時所獲的獎章。二戰中他父親曾與日本人作戰，獲得 1939 至 1945 年星章、太平洋星章、1929 至 1945 年防禦獎章。

香港警隊共有 1,050 名成員，分別是 128 名歐洲人、511 名中國人和 411 名印度人。歐洲人佔據著高職，大多數中國人和印度人只能任職警員。歐洲警官可以晉升至警司，而華籍和印裔警員最高職級只到警長。英國人從旁遮普招募錫克人，認為他們勇敢、強壯、忠誠；和在港的白人一樣，他們都是外國人，面臨危機時，他們會效忠英國；他們的英語，也比華籍警員好。英國人把印裔和華籍警員分置不同宿舍，所以他們之間沒有交往。1927 年，警務處共有 246 名歐洲人、753 名印度人、816 名中國人。1947 年印巴分治後，警局繼續從獨立後的巴基斯坦招募旁遮普穆斯林。1961 年，最後一批 46 人的受聘隊伍到達香港。

→ 軍人

如前所述，第一批來港的南亞人是印度英兵。1841 年他們隨同英國長官一

起到來。接下來的一個世紀，由印度人、錫克人和穆斯林組成的印籍英兵在英國軍隊服役，為英國在全球出征多場戰役。1947 年，印度獨立後不再允許英國繼續徵兵。軍人以外，印度人也參與香港警隊及從事保安工作，在維護法紀方面擔當重任。根據 1901 年的人口統計，當時非華裔的看更有 202 名，華裔 177 名。到了 1931 年，人口統計顯示，香港有 3,475 名印度人，當中 1,270 人是軍人，398 人是警員，127 人是公務員，1,294 人從事商業貿易，108 人是專業人士，34 人為印裔公務員當家傭或傭工。餘下的就是護衛員、看更和祭司。

→ 國際貿易

國際貿易是另一個印度人在新殖民地發揮重要作用的行業。英國建立的法治系統加上政局穩定，開展了中國與其他東亞國家貿易的新經濟機會。第一批來的印度人是巴斯人和博拉穆斯林（Bohra Muslims），信德人（Sindhis）和古吉拉特邦人（Gujaratis）緊隨其後，二者都是來自印度西部的印度教教徒。他們和中國做絲綢、鴉片和棉花生意，開店售賣商品給香港的印度英軍。到 1898 年，在港印度人共 1,348 人。

宗教、種族、習俗和語言將南亞人和本地華人分隔開。需要和本地人做生意和交流的南亞人會學習廣東話。但是這兩個群體的聯繫僅止於工作和生意，因為他們都只喜歡和自己族群通婚組織家庭。印度教徒、錫克人和穆斯林都希望保留自己的宗教、語言和習俗。家長反對跨宗教和種族的婚姻，和中國父母一樣，不想有異族聯姻。與當地相同族群，也就是他們社交和宗教生活的中心，緊密相連，於他們異常重要。他們的祖國已在外國勢力英國的控制下，一個獨立的印度，已是幾十年前的事了。

香港的英國人抱有同樣的種族純正思想。政府機構，甚或某些大公司規定，英國年輕人擁有穩定事業的前提是和相同種族的人結婚；那管是在香港或英國，子女一定要就讀英國學校。英國人把自己祖國的階級制度帶到了殖民地。在這個制度裏，印度人的地位介於英國統治者和華人之間。

→ 印度廟宇

跑馬地的印度廟是香港印度教的宗教、文化和社交中心。印度、尼泊爾和



→ 香港跑馬地印度廟中，信眾參加星期日的祈禱。

印尼巴里島共有 12,000 名印度教徒以香港為家。這座印度廟由 1949 年成立的印度教協會建造。殖民地政府劃出土地給不同宗教群體用來建設墳場。1928 年，政府給印度教社群分配的土地原用作墓園，但是印度教徒只會採用火葬而非土葬。修訂土地使用條款後，印度教社群在該址建造了廟宇。1953 年 2 月 15 日奠基，同年 9 月 13 日啟用。廟宇樓高 3 層，用圓柱將整體建築分作 6 個部分，帶一點西方影響的印度建築風格，在平坦的屋頂東南角建有一個穹頂。

禱告廳是整座建築的焦點所在，牆壁飾以寫著捐贈者名字的匾額。在香港，這是一座十分獨特的建築，俯瞰著跑馬地大受歡迎的馬場，傲然宣示印度教社群在香港久遠的歷史。在此之前，印度教徒一直和錫克教徒一起在附近的錫克廟禮拜。“政府給地，信徒出錢，把廟蓋起來。”印度廟廟宇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Lal Hardasani 在一次採訪中說道：“過去和現在，社群



→（上）在印度廟一次周日祈禱儀式上，一個女孩往濕婆林伽（Shiv Ling）中倒牛奶。

→（下）信德新年伊始，信眾在印度廟中做大銅盆（Behrano）儀式。



→ 2018 年 3 月 18 日跑馬地印度廟中，印度教信眾在周日崇拜中捐贈善款。

大部分是信德人。”除了信德人，香港的印度教社群還包括古吉拉特邦人（Gujuratis）、馬爾瓦爾人（Marwaris）、孟加拉人（Bengalis）、旁遮普人（Punjabis）、尼泊爾人、南印度人和巴里島人。

“這建築就是印度廟宇的樣子，” Lal 說道，“穹頂標示著這是一座廟。廟內有宿舍供祭司居住，宿舍包括兩個房間、一間浴室和一個廚房。祭司都來自印度。我們會優先考慮已婚祭司，因為這樣他不會孤單。現在的祭司是 40 歲的 Sham Kewlani，已婚，來自孟買。1953 年以來，我們共有過十多位祭司。”

宗教儀式通常以印度母語印地語進行，因為大多數人都聽得懂，雖然有時也會用英語。主要崇拜日是星期日和一。星期天平均有 150 到 200 名信徒參加禮拜，像濕婆節（Shivratri）這樣的大節日會有 600 到 800 名信徒

聚集於此。宗教儀式之後有免費的餐食。另一個重要節日是每年秋天舉行的排燈節（Diwali）。在香港，這些節日通常會邀請印度總領事出席。其他重要的節日還有灑紅節（Holi）、克里希那神誕辰（Birth of Lord Krishna）和十勝節（Dussehra）。還不時有海外哲人學者到來教授靈修課程。

印度廟獲政府許可舉辦婚禮，但近年許多印度人選擇海外“度假婚禮”，像泰國的曼谷、蘇梅島、普吉島和印尼的巴里島。廟宇每月兩次接待本地學生團體，讓他們學習認識印度教。“印度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種生活方式，” Lal 說，“我們向很多神靈禱告。我們尊重所有宗教。”他補充說，經過 65 年，廟宇開始有破損，“幸運的是社群很慷慨。”

印度教協會也負責為印度教徒在柴灣歌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葬。火葬場由政府管理。“我們希望 24 小時內完成火葬，” Lal 說道，“但是大多數情況都是 48 小時。如果有人在家過世，政府部門要求有驗屍報告，而驗屍報告要等 2 至 3 天。我們做這些完全不收費。”

柴灣火葬場有 12 個焚化爐，在印度協會的首任主席梅瓦尼（F.T. Melwani）努力爭取下，其中有一個焚化爐預留給印度教社群專用。“我們相信投胎轉世，只有完成救贖才能上天堂。” Lal 說。火葬儀式後，政府部門會將骨灰交給死者家屬。有些人把骨灰撒入大海，有些人則把骨灰帶回印度，撒進恒河或其他聖河中。跑馬地印度廟的開放時間是每天上午 9 時到下午 1 時，下午 4 時到晚上 8 時。歡迎散客參觀，旅行團則需預先安排。

九龍還有另一座印度廟，就在尖沙咀加拿芬道一座住宅大樓的二樓。廟宇原屬夏利里拉家族（Harilela，印裔富商家族），其後捐贈給印度教廟宇信託基金會，讓人人可用。由於大部分印度人住在紅磡、何文田、尖沙咀和九龍的其他地區，這裏對他們更方便。此外，還有一些印度教中心，像賽巴巴中心，會為小孩提供印度教課程。

“我們大部分人在家裏都有一個小家廟，” Lal 說，“每天晚上我們會舉行祭火儀式（Arti，印度教的一種宗教儀式）。”儀式用托盤放著一盞點亮的油燈、焚香和搖動鈴鐺，進行崇拜儀式。“我們的家訓代代相傳，要求孩子不論在世界哪個角落，每週一、四吃素。我們希望孩子在我們族內通



→ 雲咸街巴力大廈。當年在這條街上，印度公司雲集。

婚，不過這點可不容易辦到。他們出國讀書、戀愛。沒有相類文化，便難以維持婚姻。”

→ 印度人對香港的貢獻

Lal Hardasani 是信德人。信德人是香港最大的印度社群，有 16,000 至 18,000 人。“從 1840 年代起已有印度家庭在這裏定居，” Lal 說。“信德人在 1920 至 30 年代來港，他們在裁縫製衣業和絲綢貿易上很活躍。英國婦女喜愛絲綢，信德人從中國、印度進貨，再賣到英國去。印度人也為這裏的英軍、英國人還有本地社區做裁縫。”

1947 年英國實行印巴分治，對於信德省來說是個悲劇。印巴兩國分割旁遮



→ Dhanraj Ghale 的工作是替餐廳送外賣，他 21 年前已來港。

普和孟加拉兩省，而整個信德省被劃到巴基斯坦的一個新穆斯林州份。信奉印度教的信德人頓覺無立足之地。“100 萬信德人兩手空空遠走他方，從零開始新生活。分治對我們來講是場災難。幸運的是，我們是勤勞的群體，藉著誠實努力工作，得以興旺起來。我們就像德國人和日本人，從廢墟中再次崛起。在印度，主要在孟買，信德人興建許多大學和現代化醫院。2014 年的福布斯富豪榜顯示，印度每 100 個億萬富翁中有 8 到 9 個是信德人，而我們的人數只佔總人口 0.5%。”

印巴分治後信德人遠走他方，到尼日利亞、巴拿馬、日本和香港。對於環球貿易，信德人早有經驗。這意味著在香港的信德商人能搭通全球聯繫和資本的網絡。“20 世紀 90 年代，儘管我們人口還不到香港總人口的 0.5%，印度人的生意額在香港國際貿易中卻高佔 9%。” Lal 說，“我們骨子裏就是生意人。許多市場都由印度人開拓的。在 50 至 60 年代，香港有很多生



→ 香港印度總會主席司徒偉。

產鞋子、運動產品和衣服的廠家，老闆不懂英語，我們便當中間人，替他們和買家做文書工作。”當時中環的雲咸街都是印度進出口公司。

Lal 說他們的社群是香港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“她的增長有我們的印記。這裏已是我們的家。我樂意去印度旅遊探訪，但我們家在這裏。在香港，我們從未感到有任何種族歧視或迫害，這裏社會和諧，只要積極正向就會受歡迎。即使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戰爭期間，在這裏我們也與巴基斯坦朋友共餐。戰爭是由政治家一手製造的。不管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，政府對我們都很好。政府會就貿易問題諮詢印度商會。”

自從 1997 年香港移交中國後，社群組合開始改變。Lal 說有些人在香港移交前就離開了，移民去印度、加拿大和澳洲。“後來他們告訴我香港的商業機會更多。在英國的統治下，大約有 500 名印度人任職公務員，現在已經下降到 50 至 100 了。精通粵語是必不可少的，但許多少數族裔學校只教授簡單的中文。”過去 10 年，數以千計的印度新移民來到香港，擔任工程師、教授，或從事珠寶鑽石貿易、航運業，還有就是銀行、科技和保險業的專才。貿易仍然是印度人最重要的職業。“若是管理人員，本地缺乏的專才，或帶著錢來投資開公司，創造就業機會，就可以獲得簽證。政府不想要不合資格的工人。”

→ 印度商會

國際貿易一直是印度人在香港從事的主要行業之一。1952 年 12 月 12 日，10 名商界領袖在香港成立了印度商會，代表殖民地所有印度商人的權益。香港與印度貿易的增長，他們發揮了重要作用。20 世紀 50 年代，由於中印貿易興盛，許多印度商人移居香港。當這個城市成為重要的製造業中心，經濟欣欣向榮，這些商人，包括印度人和穆斯林，乘時而起，地位提升。自那時起，商會一直為社群服務，現已有約 500 名會員。它列出的目標包括：促進、保護香港和華南的貿易、商業、航運和製造業；代表並表達印度社群對商業利益議題的意見，包括立法層面的。它是印度商界與特區政府之間的界面。

司徒偉（Raj Sital）是香港印度總會主席，該總會成員有香港印度商會、香港印度協會、印度教會、印度會、香港印度婦女會、錫克教會、新印度會、印度僑民協會，和海外印度人協會。



→ 重慶大廈內，一位暱稱“Maxi”的印度店主攝於自己的牛仔商舖內。Maxi 在香港唸書，已在香港生活了 13 年。

→ 司徒偉

“總會在 40 年前由夏利萊（Hari Harilela）創立，”他說。“9 個協會成員涵蓋社會、經濟和宗教團體。在他逝世前一年，夏利萊博士（Dr.Hari N. Harilela）提名我任總會主席。香港有 1,000 至 2,000 家印度公司，印度商會內有超過 500 家。其中 5 至 6 成是本地印度企業，已有 2、3 代人在這裏生活；約 20% 是印度大型公司的分行；協會有 20% 為個人會員，大部分是在大公司工作的專業人士。航運管理是印度人的強項，這行業中，許多公司都有一位印度 CEO。香港印度總會是本地團體，而不是像美國商會那樣的外國商會。總會有權簽發“原產地證書”，和其他 4 個地方商會不同，我們在立法會沒有議席。”

“截至 2013 年，印度公司貢獻佔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的 8%；現在，這個數字已降到不足 5%。我們在非洲、南美、東歐、中東、獨聯體國家和亞洲等市場網絡強大。這些國家的客戶沒有自由兌換貨幣，我們可以提供本港和內地廠家，與這些國家間的貿易融資。長達 45 至 60 天的貨運期，讓廠家難以向客戶提供信貸。但因為我們在這些國家都有聯繫，就能夠做到這點。”

司徒先生對印度人一直以來為香港作出的貢獻引以為傲。“天星小輪由印度人創辦，”他說，“匯豐銀行第一任董事會的 13 名成員中，有 3 名是印度人；香港大學的創始人之一是印度人。我們傳統以慈善事業回饋社會。夏利里拉家族非常慷慨。就經濟方面而言，我們的貢獻在貿易、房地產、服裝、紡織和裁縫業。巴斯人從城市建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這裏。

“印巴分治，整個信德省劃分給巴基斯坦，一些信德印度教徒傾向移居到大英帝國的屬地，例如香港、新加坡、加納、尼日利亞、直布羅陀和伯利茲，在這些地方他們有遷徙自由。他們到達後第一件事就是置業——住屋、商舖和業務。只要有物業，任何銀行都會借貸給你。對印度人來說，裁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行業，其中 Sam's Tailor 是最著名的。現在年輕人不喜歡做裁縫。所以現在的西裝都是在香港度身，深圳製造。

“20 世紀 60 至 70 年代，我們在尋找市場、為香港產品提供融資方面，發揮重要作用。我們有一個全球網絡。我們在社群內通婚，所以很多居住海外的都是我們的遠房親戚。”

印度人在 1997 年之前都移民了嗎？“也有一些。但隨後又回流，更後悔自己的決定。他們在房地產市場損失慘重，因為這裏的房價比移居地的上漲快得多。回歸前，我們曾多次前往北京，和港澳事務辦公室的人會面。官員向我們清楚表明，由於我們不是華裔，所以不會獲得中國國籍。因此，我們遊說英國政府、港督彭定康、（英國）內政部和議會，給當時沒有國籍的香港印度人英國國民護照。我有資格申請特區護照，但必須放棄其他國籍。另一方面，持外國護照的中國人，如果他國容許多重國籍，便無需放棄外國國籍就可以獲得特區護照。不過，印度不容許雙重國籍。因此，在交接 3 個月前的限期內，許多印度人放棄了特區護照，以便有資格獲得英國護照。大約 20,000 至 30,000 印度人獲得了英國護照，相當 85 至 90% 的本地印度人，獲得英國屬土公民（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

Citizens，BTDC）身份。這是一個非常人道的決定，我們十分滿意。在“六四事件”之後，英國政府發放的 5 萬份英國護照中，有少數印度人獲發英國國民護照。

“1997 年之前，中國政府向我們保證，回歸後外國企業享有和過去一樣的特權和條件。他們想讓我們知道五十年不變，這使我們感到安心。”

→ 1997 後有何改變？

“現在印度人貢獻佔香港國民生產總值已降至 5% 左右。這是由於中國國有銀行大舉融資，提供廉價信貸。中國銀行在香港的分行比匯豐銀行還要多。內地和香港公司可以從中國國有銀行獲得信貸融資，導致我們和“中港”公司的競爭加劇。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也向我們招手。因我們可靠，違約率非常低。結果，一些小型貿易公司倒閉了。年輕人不想在這些公司工作，他們想成為專業人士。大部分製造業業務已分判給內地。不設廠生產，要轉換產品便更容易。

“97 前，香港的印度人數處於 2 萬多一點。現在有 4 萬人——大部分是大公司聘用的專業人士，比如航運船隊管理。若有大公司幫忙申請，很容易就獲得簽證。7 年後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。

“特區政府給予我們的待遇，與 97 前殖民政府統治下沒有兩樣。現在很少印度人在政府部門工作。1997 年仍任職政府部門的印度人，沒被迫強制離職，仍可繼續待下去，但已再沒有新人入職。之前，會說粵語足以任職政府官員；現在卻必須會讀寫中文。我們已就這方面遊說政府，我們認為，不一定需要書寫中文的工作，應該聘用印度人。1997 年前，政府中官職最高的印度人是巴加特（Ish Bhagat），他擔任監獄監督；還有鮑文（Barma）先生，官到運輸司。

“一直以來，這裏的印度僑民都不想搬回印度。這裏沒有印度學校。印度人送孩子到國際學校，從而可以去外國升讀大學。但是，在過去一年裏，第一次有討論在香港設立印度學校，開設印度課程。這是因那裏（印度）經濟已經改善，生活水準也同時提高，有些人期待回去。教育署已要求我們提供有關詳情；就如對其他國際學校一樣，可以提供我們一個適合地點建校。”

今天，香港的印度社群是非常多元化的。許多人仍從事傳統行業如國際貿易、餐館、零售和裁縫業，但也有數以千計的人是專業人員，在國際公司、金融、保險、醫藥、媒體、航空公司、航運、旅行社、瑜伽和鑽石行業工作。印度人能說多國語言。他們說各種母語，像旁遮普語、古吉拉特語、信德語，孟加拉語和泰米爾語；而大多數人會說英語。在 2011 年的人口普查中，37.2 % 的印度人說他們以英語為通用語，4.6% 說粵語和 57.9 % 說其他語言。其中，10.8 % 的人表示，他們並不以英語作為他們的通用語或第二語言；同一問題，換作粵語和普通話，答案分別是 64.7% 和 93%。

1. 2018 年 4 月 4 日與香港印度總會主席司徒偉（Ray Sital）訪談。
2. 2018 年 3 月 13 日與 Lal 保險經紀公司總經理 Mr. Lal Hardasani 和 Nexus Marine 總經理 Dr. Ravindra Shroff 訪談。
3. 《香港的印度群體》（The Overseas Indian Community in Hong Kong），Professor K. N. Vaid，香港大學，1972。

印裔 社群長老

042 — 043

夏利萊



→ 夏利萊是夏利里拉集團創始人、主席，2014 年逝世。

夏利里拉家族是香港最富有、最知名的印裔望族。家族企業夏利里拉集團持有並營運 14 家酒店，遍及香港、中國內地、檳城、新加坡、倫敦、加拿大和紐約。這些家族酒店包括金域假日酒店，九龍的海景嘉福洲際酒店，新加坡樟宜機場的兩家大使酒店。超過 50 名家族成員同住在九龍塘的超級大宅內。大宅僅服務人員就超過 50 人。在香港，沒有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單戶住宅，恐怕在中國其他地方也如是。

家族長老夏利萊於 2014 年 12 月 29 日逝世，終年 92 歲。他是個重要的公眾人物，是兩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的密友，北京中央政府的香港事務顧問，更獲香港政府頒授多項勳銜。

他同時是一個慷慨的慈善家，向慈善機構和高等院校多番捐獻。他逝世後，由唯一的兒子夏雅朗（Aron Harilela）繼任夏利里拉集團董事長一職。夏利萊有 5 個兄弟。家族在二戰後從事裁縫生意，賺到了第一桶金。1959 年，家族創辦夏利里拉集團，進軍酒店業，如今酒店業已成為集團的主營業務。此外集團還有出口和旅遊業務。

家族史

自 1911 年以來，該家族就一直居住在香港。Naroomal Harilela 是家族來中國的第一人，當

時他離開現屬巴基斯坦的故土信德省，到廣州尋找機會。經濟大蕭條前，一直生意興隆。美國經濟崩潰致使公司破產，他被迫舉家遷往香港，而子女（包括排行第二的兒子夏利萊）也得外出打工。

夏利萊決定從事裁縫業。這明智的決定為家族帶來第一桶金。當時香港很多印度人都跟風做裁縫。二戰期間，夏利里拉家族居於香港。和香港其他居民一樣，1941 年 12 月到 1945 年 8 月的日佔時期，對他們來說是痛苦的經歷。雖然家族中沒人被抓，但他們日子也不好過；雖然仍以裁縫為生，然而生意有限。戰後，家族憑藉與駐港英軍、美軍交易發跡，從香港擴展到亞洲一帶。夏利萊父親 Naroomal 於 1948 年逝世。

1959 年，夏利萊兄弟成立夏利里拉集團。1961 年，藉收購香港帝國酒店後進軍酒店業。酒店業隨後成為集團的主要業務。旗下 14 家酒店業務遍及香港、中國內地、歐洲、加拿大和美國。

家族大宅

整個家族共居於九龍塘窩打老道一棟有 40 間臥室的大宅，以及延伸建設的一棟 28 臥室附樓。家族四代人生活在同一屋簷下。宅邸地下停車

場可停放 20 多輛車，大宅共有 30 名家傭、3 名廚師、6 名司機及多名維修工、園丁為家族服務。宅邸最矚目之處是廟堂，每個家族成員每天早餐前都會來此禱告。夏利萊社交生活繁忙，他經常在那大吊燈裝飾的宴會廳舉辦盛大宴會，客人中有資深政治家，商界大亨和來訪的印度名流。

夏利萊活躍於公眾視野，是 6 個兄弟中最為人認識的。他是兩任特首董建華、曾蔭權的密友，英國殖民時期的港督和 97 後特區政府行政長官都曾向他諮詢。他獲頒授香港大紫荊勳章、金紫荊星章和 OBE（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）勳銜。“在許多少數族裔議題上，他在政府中有很大大影響力，” 香港印度協會主席 Mohan Chugani 說。他亦是活躍的慈善家，曾向香港科技大學等教育機構慷慨捐贈。“慈善始於家園，香港就是我的家，所以我將所有慈善事業回饋給香港人。”

2014 年 12 月 29 日，在家人的陪伴下，他在九龍塘家中過世，享年 92 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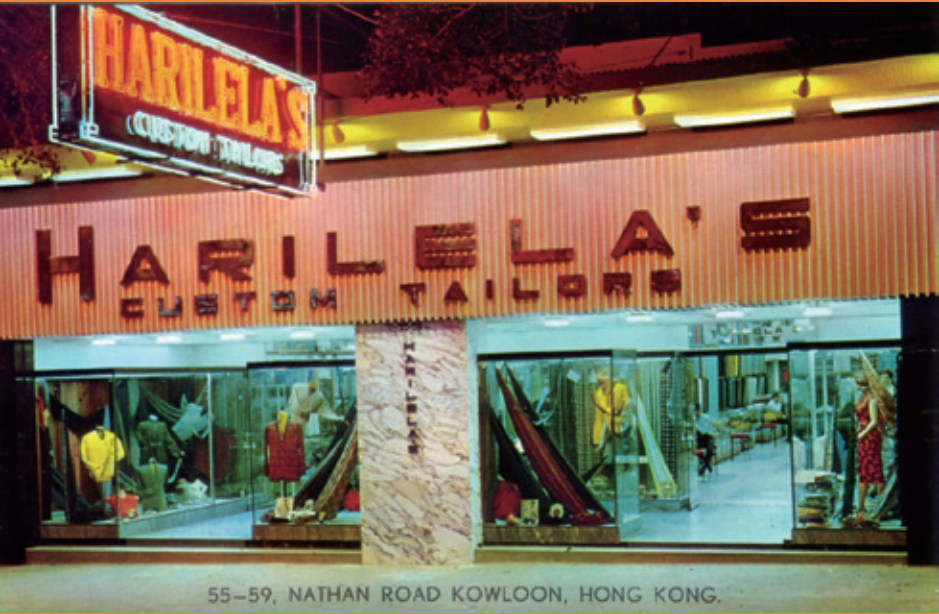
在訃告中，家人是這樣描述他的：“作為丈夫，他深情專一；作為父親和祖父，他慈愛有加；作為兄弟，他友愛和睦。他鼓舞了整個家族，是所有人的真誠朋友。”

兒子夏雅朗繼任集團董事長，“（我父親）為人

慷慨、謙遜，思想開明及富前瞻性。”夏雅朗說。

“他一直鼓勵我去追求生命中的所有事情——學習、家庭、事業；而朋友也同樣重要，”他補充道。“公司依然堅持創始人奠定的價值觀。時代瞬息萬變，像我們這樣的生意必須開放思想接受新觀點和新思維方式。經營夏利里拉集團時，我總能想起父親教我的：做生意和做人，正直誠信最重要。”他說。

夏利萊和夫人 Padma 結婚六十載。除了夏雅朗，夏利萊還有 5 個女兒。



→ 位於彌敦道 55-59 號的夏利里拉洋服店，攝於 60 年代。

1. [夏利里拉集團官網](#)。
2. 《南華早報》2014 年 12 月 30 日。

五代 巴斯人

046 — 047

吉米·麥斯特



→ 吉米·麥斯特在銅鑼灣拜火教廟宇內。

告士打道吉米·麥斯特（Jimmy Minoo Master）辦公室裏，一張張鑲在相框的結婚照和其他的家庭照，為工作間帶來一點個人化。在其中一張照片，吉米身穿白長禮服，頭戴黑禮帽，這是一套巴斯男性在婚嫁和其他重要場合穿著的傳統服飾；他的妻子身著飾以細緻刺繡花邊的紗麗。

吉米和合夥人經營一家小型資產管理公司，已經超過 20 年。吉米生於 1955 年，是家族在香港的第四代人。第五代的代表，是他的兩個女兒——一個是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獸醫，另一個是路透社的記者，兩人現都居港。

“據我瞭解的家族史，我曾祖父的哥哥大約在 1910 年到達香港和廣東一帶，在孖士打律師行工作，”他說的是亞洲歷史最悠久的律師行之一。“幾年後，他把他弟弟帶到香港，兩個人決定在這裏開始貿易生意。

“那時候華人對棉紗，還有其他進口物資需求甚大，他們就從印度進口這些東西，後來又從中國出口像絲綢、香料、紗麗等到印度。”

在早期的英屬香港殖民地，巴斯小社群內大部分

都是男人。20 世紀 20 年代，新婚不久的吉米祖母從印度來港和丈夫團聚，成為社群的第三個女性。

“那時候大部分男人都是獨自出來打拚。他們在亞洲待好幾年，每兩三年回家看看家裏人，見見妻子，可能趁著回家再生幾個孩子，”吉米說。“但是從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，把妻子從印度帶出來逐漸成為習慣，慢慢地，以一個個完整家庭組成的巴斯社群漸漸成形，持續至今。”

吉米的母親今年 92 歲，在香港出生。她的家族源自孟買，吉米父親的家族來自大吉嶺。巴斯人是伊朗難民的後裔，大約 1,200 年前，其先祖逃難到印度最西的古吉拉特邦（Gujarat）沿岸定居下來。

“所以我們繼承了古吉拉特語，穿古吉拉特服飾，即紗麗，我們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源自印度教文化和傳統，”吉米說。然而，在這裏出生，在這裏生活了一輩子，“我現在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了”。

巴斯小孩以父親名字作中間名。米諾是他的父親，也就成為吉米的中間名。吉米的女兒們都繼承了吉米作為中間名——女性以男性名字作為中間名是很罕見的——但是吉米堅持延續傳統。在印度被殖民之前，人們一般稱呼巴斯人為“某某的兒子”——例如，米諾的兒子吉米。英國人到來後，為了做人口普查，開始給印度人編纂名字。

“他們起的名字，要麼是你的家鄉名，要麼是你的職業，”吉米說。“所以我能想像很久之前，我們的先祖可能是老師，或是從事教育工作，麥斯特（Master，師傅）”這個姓一定是這麼來的。看看我們的巴斯社群，你會發現有很多跟貿易、家鄉有關的名字，這個傳統一直在延續。”

近年來，香港巴斯人口有所增加。多年來人數約 120 至 150 的小社群，近年增加到約 240 人。“主要是因為一些年輕巴斯家庭從印度被調派過來，在銀行、金融或物流行業工作。”他說。

香港為家人提供了安全的環境，吉米對這一點深表感激。考慮到香港地少人多，他很高興自 19 世紀 50 年代，巴斯人已有自己的墳場。

但同時，他又因這裏的一種傳統工藝失傳而傷感，

美麗的刺繡一般用作紗麗裝飾，從前這種精緻複雜的手工刺繡都是從香港和中國南方出口到印度的。

“這曾是很多人的大生意。這種技藝已經失傳了。所以今天在很多巴斯人家裏，如果還能找到這種舊紗麗花邊，是值得自豪的，把花邊縫在現在的紗麗上，在隆重場合才會穿著。”

吉米的曾祖父創辦的貿易公司名為巴利父子有限公司（K. S. Pavri and Sons Ltd.），註冊地址位於雲咸街——地面一層是倉庫，2 樓是辦公室，3 樓是住宅。吉米就在那裏長大。在日本佔領期間，倉庫遭到洗劫，公司很多檔案文件和紀念品已遺失。他們一家和其他人一起住在大樓裏，靠變賣部分首飾換取食物維生。

吉米的辦公室地上鋪著伊朗地毯。他的妻子是伊朗拜火教徒（Zoroastrian），他們在印度相識。“所以我們的文化裏也有伊朗的影響。她嘗試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加入伊朗文化。她的名字是 Niloufer，意思是睡蓮，我們是在孟買相識的。”

“別把拜火教徒（瑣羅亞斯德教徒，Zoroastrain）和印度拜火教徒（巴斯人，Parsee）混淆。拜火

教（Zoroastrianism）代表著一種信仰，而印度拜火教徒（巴斯人）是 1,200 年前從伊朗逃難的拜火教徒後裔。所以在伊朗你會看到拜火教徒（Zoroastrian），而在印度你會看到追隨拜火教的印度拜火教徒（巴斯人）。別把二者混為一談是很重要的。”

吉米的兩個女兒都和社群外的人結婚，一個嫁給了荷蘭人，一個和英國人成婚。“就傳統而言，我覺得她們有很強的巴斯人觀念，”他評價兩個女兒道。“我想在她們成長過程中，讓她們知道自己是誰，來自那裏，希望她們會延續一些傳統，就像她們看到我們過去幾十年是如何傳承的。”

香港 人人平等

050 — 051

馬夏邇和吉杜馬爾



→馬夏邇女士和丈夫吉杜馬爾。

馬夏邇（Shalini Mahtani, MBE）和她的商人丈夫拉維·吉杜馬爾（Ravi Gidumal），為在港南亞人士平權運動扮演重要角色。25 年來，他們為印度、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亞人爭取平等權利不遺餘力，致力於建立一個以多樣化為核心的社會，務求這些少數族群在政府諮詢委員會、私營公司董事會或其他各種不同社會組織都有發聲地位。

他們的功績包括 Gidumal 在 1997 年回歸前，成功為無國籍非華裔人士爭取到英國護照；他又與社工兼社運人士王惠芬合作，最終促使香港於 2006 年通過了反歧視法。

馬夏邇從事金融行業，後創辦了非牟利組織“社商賢匯”，以提升社會的多樣性。幾年後小彬紀念基金會成立，這是一個傑出的社會政策智庫組織和慈善機構。2009 年馬夏邇夫婦年僅 3 歲的兒子 Zubin Mahtani Gidumal 突然離世，基金會便以他們兒子命名。Zubin 意思是“表揚或服務”。組織貫徹實踐 Zubin 之名，以消除窒礙平等機會的屏障，向政府提供政策意見，並創立培育人材計劃為其宗旨。

馬夏邇 1972 年出生於香港，外祖父是已故商界大亨夏·佐治（George Harilela），即夏利萊（Hari Harilela）的長兄。

“我媽媽夏美娜（Mira Harilela），後來的馬美娜（Mira Mahtani）在香港出生；父親 Ramesh Mahtani 則生於信德省的海德拉巴（Hyderabad），來香港時他還是個孩子。”她說，“我父母的戀愛在我這一代人看來是很特別的。因為我爸是港島男孩，我媽卻是個九龍女孩，這在當時來說，可是個大問題。（當時）香港島和九龍之間距離遙遠。我們今天回想起來，還是覺得很有趣。”

說到她的背景，“我想我是夏利里拉家族較年長的孫輩之一。但是女孩和男孩的待遇區別很大。身為女孫和男孫也很不同，因為我不能繼承姓氏。在我們的傳統裏，我不得不承認，我覺得這個傳統是錯的，男孩繼承姓氏，按傳統得到一切相關利益，而他們有權評價你。

“普遍而言，我媽媽作為她那代第一個出生的夏利里拉孩子，因為是女孩，她結婚後將進入另一個家庭，所以她將不再是夏利里拉家族的人。成為女人後，你失去自己的身份，之後再獲得另一個身份，你屬於另一個家庭。”

今天依然如是。馬夏邇女士猜想在 she 所認識的信德女性中，她是極少數保留本姓的其中一人。

“對來自保守文化的家庭來說，選擇在自由氛圍下培養孩子，卻又期待他們將來採取較傳統的價

值觀，無疑是個很高的要求。對，這的確有趣。我確實認為信德家庭結構是很父權的，而我卻跟一個思想自由的人結婚。我們彼此相愛，他的家族在香港歷史悠久。

“他父親在上海長大，他的家族比我的家族早一代人離開印度，他媽媽是個受過教育的工作婦女。而我 1972 年出生，1990 年上大學，對於兩邊的家族，就是我母親這邊的夏利里拉家族，和父親這邊的馬他尼家族而言，這（上大學）可是件大事。我要爭取多年才得到。”

馬夏邇回憶起她 13 歲在港島中學唸書時的小插曲。在一節歷史課上她被問到有什麼抱負？她說她要成為印度的總理。“他（老師）笑了，說：不可能，信德女孩的前途就是結婚。”

另一種形式的歧視，加強這對夫婦對平等的熱切追求。1993 年初，後來成為馬夏邇丈夫的 Ravi Gidumal，和朋友外出玩樂，正準備進入蘭桂坊一間酒吧。其他朋友都進去了，只有他在入口被攔下，並被告知這是個私人派對。雖然他知道香港有歧視問題，可從來沒有親身體會過，當發現種族歧視在香港居然沒有抵觸法律，震驚之餘，更促使他採取行動，他帶領印籍人士資源小組（Indian Resources Group）為香港以印裔為主的無國籍人士奔走，爭取在香港回歸時獲得英國國籍。他同

時與社工王惠芬長期並肩作戰，為通過反歧視法孜孜不倦地努力。

“在我的成長路上，一直有不同種族的朋友，所以我雖然知道種族主義或者歧視的存在，卻沒意識到這問題有多根深蒂固。歸功於我父親，他架起了種族溝通的橋樑。20 世紀 50 年代，他以印度人的身份成為香港哥爾夫球會會員，實在不簡單，” Gidumal 說道。

1993 年 Gidumal 進酒吧被拒，這件事觸動了他。他和一位朋友大事宣揚，包括通告媒體，寫信給時任港督彭定康，到立法局申訴，就“種族歧視為何不違法”遊說政府。此事反響很大，一個關注到少數族裔回歸後將成為無國籍人士的團體找上了 Gidumal。這不僅關係到南亞少數族裔，其中也涉及俄羅斯人和中東人。

從香港到倫敦上議院，Gidumal 帶領的戰爭持續了 5 年。結果 1997 年 2 月 4 日通過《1997 年英國國籍（香港）法案》，讓香港非華裔少數族裔取得英國國籍。這是 100 多年來首個由上議院發起、下議院通過的英國法案。小組的努力，得到前港督衛奕信和麥理浩在英國的支持。

“基本上，我們只是少數人卻能打敗政府。一群年輕人走出來，某程度上，改變了歷史，我們改

變了許多香港人的人生機遇。這事影響巨大。”

2003 年，馬夏邇成立“社商賢匯”，這是一個利用商業力量推動改變的非牟利機構。通過調查研究、多元名單（以少數族裔自薦名單形式邀請各行各業、有能力並合資格的少數族裔人士，向政府推薦加入政府的諮詢委員會）、啟發引導和授權員工確保工作地方達到多元共融的狀況。Gidumal 同時繼續為少數族裔爭取權利，包括和社工王惠芬合作，後者在推動 2006 年《香港反種族歧視條例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。

“我極度尊重王惠芬和她所做的事情，” Gidumal 說，“她大半生不僅奉獻給立法事宜，並且盡力改變香港少數族裔的艱難處境。”但他說這需要不斷教育。

至於小彬紀念基金會，他說，“基金會的很多工作都圍繞著香港少數族裔，我們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慈善機構，但是夏邇在這方面已經工作了很長時間，慈善真是她心之所向、激情所在。她的團隊在基金會的工作圍繞著少數族裔特殊教育需求，以至有關香港少數族裔的一般情況，嘗試為他們提供導師計劃，推他們一把。”



→ 馬夏邇女士和丈夫 Ravi Gidumal 與他們的孩子：Anya（左）和小彬（Zubin）。小彬三歲時不幸離世，故夫婦二人以其名字成立“小彬紀念基金會”。

雙語棟篤笑 喜劇演員

054 — 055

阿 V



→ 阿 V 贏得全港中、英文棟篤笑大賽冠軍。

印度裔香港人阿 V (Vivek Mahbubani) 剛剛抵達麥當勞道聖保羅男女中學，他是這次“減壓週”的早會演講嘉賓。學生在上課前，將可以大笑一回。今年 35 歲的阿 V，也許會在這裏啟發到下一代的棟篤笑演員。

阿 V 精通雙語——他是印度信德人，家住香港西營盤，在家說英語長大；他就讀本地學校，學習粵語和中文讀寫到小學六年級。“我看得懂餐牌，也知道什麼時候會打 9 折！”他說。

他出色的棟篤笑事業為他帶來殊榮，2007 年和 2008 年，他分別榮膺全港中文、英文棟篤笑大賽冠軍，同時擔任香港電台電視節目《香港故事》主持人。他更是香港 The TakeOut Comedy Club 的台柱。

他還經營自己的網站設計公司，棟篤笑事業起飛，橫越亞洲後，他現在只專注於棟篤笑。他剛從墨爾本喜劇節回來，在那裏演出一系列粵話棟篤笑。

“我想說一個好的棟篤笑演員能從不同的角度觀察生活。所以棟篤笑不是讓你去過搞笑的生活，或者從一個搞笑的角度看待生活，而是說‘喂，等一下，從未這樣想過啊。’然後用搞笑的方式呈現出來。這就是棟篤笑。”他說。

他是家族的第三代香港人。“我祖父和父親都是典型的做進出口生意的印度人，什麼賺錢便做什麼，賣這賣那。”

“他們告訴我，我父系來自加爾各答，母系則是孟買，就是這種不同地域的結合。但因離開已久，所以他們這個‘根’，沒有其他比香港重要。很多人（從印度）來香港做生意，就像一個大家庭，香港有個這樣的笑話，就是所有印度人都互相認識。”

他父母熱衷讓孩子學習粵語，所以阿 V 雙語皆通。“這正正是扭轉的契機。我是印度人，在香港長大，說粵語和英語，而我的母語印度語和信德語卻沒那麼好。我聽得懂母語，有人對我吼叫時我也知道。但是如果我在印度，就得要經一番掙扎。

“我父母認為，既然我在香港長大，學習本地語言非常重要，所以他們送我到一所中文學校。這時挑戰來了，那時候，融合非華裔學童的本地學校並不多，正因為這樣，他們對我就和對其他學生一樣——沒有特殊待遇。這幫助我真正融入了社會，和其他學生一樣學習中文，一起學習讀寫等等。”

阿 V 說起自己回印度的時候，“沒錯，我的確有歸屬感，我理解自己某些做事的方式，而且很快

融合。但我喜歡並且沉醉於一種‘我好顯眼，格格不入’的想法，這種想法讓我對生命有完全不同的視野。所以我在香港常常說笑，我可以是本地人，又可以是外國人，視乎情況而定。”

對喜劇新人來說，香港的 The TakeOut Comedy Club 是磨練新招的絕佳平台，但是他們主要以英語演出。所以阿 V 自行製作粵語棟篤笑。“我們的組合叫‘爆笑館’。我們定期在香港找場地做表演。我想（來演棟篤笑的）小朋友覺得，喂，我有趣事要說，我想試試看。

阿 V 的姊姊 Krishnaa，今年 38 歲，是個有博士學位的化學工程師。“我和我姐正好相反。她鑽研學術，我則更有創造力；她愛理科，我好文科。”

在阿 V 成長階段，父母很重視教育，為了學習，有時候他們會犧牲假期。他父母的婚姻由家人安排。

“在印度文化裏，婚姻由家庭安排很正常。”他說。“不是因為我們懶得自己尋找伴侶，而更像是一種方式，幫我們瞭解對方的家庭，看看我們是否門當戶對。有些人說這種婚姻沒有愛，但是愛是可以隨著相處培養的，而不用擔心我愛她或他但我不喜歡她或他的父母，那樣的話會造成家庭不和。

“所以安排婚姻是很正常的事。父母到了一定年紀就會和你說，‘仔呀，女呀，係時候結婚囉喎，去搵搵啦’等等。我們就會問朋友，‘喂，有冇單身朋友？會唔會有興趣？同佢地見吓面傾傾啦。’這很正常。這就像閃約，但有更大結婚可能，而且是——馬上就結！

“我母親的家庭很保守，她在五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，兄姊結婚後，就輪到她了。”

阿 V 視自己為印裔香港人

“我不喜歡‘少數族裔’這個詞。因為這自動把人分類。老實說，這是一個灰色地帶。每當有人提到少數族裔，他們的腦海裏就浮現出棕色皮膚的人。然而當見到我的白人朋友，我會問，他是少數族裔嗎？並不是。為什麼？嚴格來講他也是少數族裔。”

阿 V 在學生的早會演講上指出，許多被視為真香港的標誌——天星小輪、香港大學——都是由多個不同種族的人共同資助建立的。

“少數族裔這個詞聽起來就像我們周圍還有一群這樣的人。不，我們都是香港人，只不過你剛好是香港華人，我剛好是香港印度人。所以，我強烈建議這個詞應該更新了，而且我相信很快就會

實現。”

小時候，阿 V 每星期日都會和家人一起去印度廟。他覺得這種規矩及家人共度的時間很重要。“週日是家庭日，是培養價值觀的時候。但我已經很久沒去那廟了，我父母也沒叫我去。”他說，父母的關注點都在他的學習上。“去寺廟不是為了讓我信教而是讓我成為一個好人。”

